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

丛书主编 徐志伟

“左翼文学”研究读本



徐志伟 张永峰 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

丛书主编 徐志伟

“左翼文学”研究读本

“ZUOYI WENXUE” YANJIU DUBEN

徐志伟 张永峰 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翼文学”研究读本 / 徐志伟, 张永峰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 / 徐志伟主编)
ISBN 978-7-5495-9629-4

I. ①左… II. ①徐…②张… III. ①左翼文化运动—
文学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58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95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于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曾一度带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这一范式强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针对性。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它当年直接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瓦解,它的革命性就大大减弱了,而它的局限性则暴露得愈益明显。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动,学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日益深入,新的研究思路破土而出,主要表现为:第一,研究者开始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吸收思想界近年来深入反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的成果,将“反思现代性”的维度加入到研究之中,重新检讨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及其现代性质;第二,研究者有意识地征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突破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区分,不断引入民族国家、政党政治、出版、教育、学术史、社会史等视角来呈现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

这些新的研究思路超越了“启蒙/革命”“人/人民”“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开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但迄今为止,这些新的研究思路还处于局部的尝试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宽。正是基于此,我们决定编纂这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读本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全面总结新世纪以来海内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以期引发新的学科反思和学术争鸣,促进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图景。

“丛书”首批推出六卷:《“晚清文学”研究读本》《“左翼文学”研究读本》《“延安文学”研究读本》《“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八十年代文学”研

究读本》《“底层文学”研究读本》，编者分别为：张春田、徐志伟、张永峰、刘卓、贺桂梅、刘复生、李云雷。“丛书”所使用的“晚清”“左翼”“延安”“50—70年代”“八十年代”“底层”等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或流派的概念，而是特定的“知识构造”的指称。“丛书”的主要编选对象是新世纪以来基于新的时代条件所产生的具有方法论自觉、洞察力及生产性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个别虽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却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丛书”也酌情收入。

“丛书”编竣之时，新世纪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纵观这十五年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虽然其深陷困境，步履维艰，但一直没有放弃与其他学科及变动的社会现实对话的努力。正是这样的努力，使我们愿意相信：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诞生为期不远。

编 者

2016年5月

· 目 录 ·

· 思潮与论争 ·

- 002 钱理群 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存目)
- 002 李志毓 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存目)
- 002 李 杨 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 (存目)
- 002 吴述桥 “第三种人”论争与“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从“左联”
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谈起(存目)
- 002 黄 悦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存目)
- 002 程 凯 “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存目)
- 003 小谷一郎 郭沫若与 1920 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孤军派”——
论郭沫若“革命文学”论的提倡、广东之行、参加北伐的
背景及其意义
- 027 程 凯 当还是不当“留声机”? ——后期创造社“意识斗争”的多
重指向与革命路径之再反思
- 048 齐晓红 当文学遇到大众——1930 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管窥
- 069 旷新年 山重水复疑无路:左翼文学的历史生成
- 077 蒋 晖 中国农民革命文学研究与左翼思想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 “革命加恋爱”模式 ·

- 090 王德威 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存目)
- 090 贺桂梅 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
爱”模式解析(存目)
- 090 李松睿 “文学”如何想象“革命”? ——论早期“革命文学”的情节

模式(存目)

- 091 刘剑梅 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动

· 左翼鲁迅 ·

- 114 张历君 时间的政治——论鲁迅杂文中的“技术化观视”及其“教导姿态”(存目)
- 114 李国华 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与鲁迅杂文形式(存目)
- 114 蒋洪生 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存目)
- 114 汪 晖 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存目)
- 114 李国华 行动如何可能——鲁迅《故事新编》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存目)
- 115 薛 毅 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
- 157 张旭东 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 184 程 凯 “硬译”与“文化革命”的主体性问题
- 220 罗 岗 阿 Q 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 Q 正传》

· 文本细读 ·

- 234 罗 岗 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存目)
- 234 徐秀慧 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存目)
- 234 张 勇 1930 年代张天翼小说中的“反摩登”叙事(存目)
- 234 熊庆元 乡村建设、社会改造与“革命青年”——从《丰收》中的两组细节看 20 世纪 30 年代的起源语境(存目)
- 235 陈建华 “时代女性”、历史意识与“革命”小说的开放形式——茅盾早期小说《虹》读解

- 261 李国华 黄金和诗意——茅盾《子夜》臆释
- 279 贺桂梅 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 292 高俊杰 蒋光慈后革命写作的策略性——论《冲出云围的月亮》对茅盾《追求》的逆写

· 左翼与都市空间、现代主义 ·

- 318 铃木将久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思想与现代主义(存目)
- 318 李永东 租界文化语境下左翼文本的叙事症候(存目)
- 318 旷新年 另一种“上海摩登”(存目)
- 319 陈建华 喧嚣的“左翼”——1920年代末北伐革命与上海世界主义
- 346 葛 飞 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
- 360 张屏瑾 从摩登恋爱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与都市书写

· 左翼电影与戏剧 ·

- 372 葛 飞 战前上海左翼剧团的营业性演出与“大戏院”及影业危机之关系(存目)
- 372 葛 飞 戏剧大众化实践的政治空间及其承担者——兼论“剧联”组织性质的演变(存目)
- 372 王雪芹 乡村公共空间的雏形与定县戏剧试验的创作衍变(存目)
- 373 罗 岗 左翼思潮与上海电影文化——以《神女》为例
- 386 李玥阳 在南京国民政府与左翼电影之间——以孙瑜电影为例

· 左翼思想的旅行 ·

- 402 长堀祐造 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存目)
- 402 李 今 苏共文艺政策、理论的译介及其对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

影响(存目)

- 402 张广海 再论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存目)
- 402 王志松 “藏原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坛(存目)
- 402 徐秀慧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存目)
- 403 张历君 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
- 444 王宇平 “同路人”问题在中国——以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 456 编后记

【思潮与论争】

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存目)

/ 钱理群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存目)

/ 李志毓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存目)

/ 李杨

(原载李杨著，《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三种人”论争与“左联”组织理论的转向——从“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问题谈起(存目)

/ 吴述桥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意蕴(存目)

/ 黄悦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存目)

/ 程凯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郭沫若与 1920 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孤军派”

——论郭沫若“革命文学”论的提倡、广东之行、
参加北伐的背景及其意义

/ 小谷一郎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 192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状况的话,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思想的“生成期”或“分化的时代”。“五四”前后还处于混沌状态的各种思潮,在与其他思潮的对立和分化的过程中,其思想倾向逐渐明确起来。这一时期,几乎是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并与其产生最激烈的冲突、分化的思潮是 1920 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研究中国“国家主义”的李义彬很早以前就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 1926 年,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国家主义派斗争最激烈的年代。”^①

李义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国家主义派斗争”是指以下史实:正如李义彬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大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这个学会中的右翼分子。国家主义派形成的过程,是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分化的过程,是学会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右翼知识分子不断斗争的过程”。论战是在以少年中国学会内信奉“国家主义”的人为中心结成的“国家主义”团体“醒狮派”,和以同一学会内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之间进行的。

《醒狮周报》于 1924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创刊,“醒狮派”是指依附于

^① 李义彬:《国家主义派的形成及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动活动》,《历史研究》1965 年第 5 期。

《醒狮周报》的人们^①。“醒狮派”从1925年开始,作为“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指导者领导了192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运动。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把“醒狮派”作为1920年代中国“国家主义”的典型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此外,少年中国学会七名发起人中有“醒狮派”的曾琦,还有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他们二人在1918年6月时还是步调一致的。不久,围绕“主义的采用”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信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居于二者之间的“学究派”三个派别。这一事实是1920年代中国“思想分化”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中国青年》密切关注着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论争,从《醒狮周报》创刊伊始的1924年11月就开始了同“醒狮派”的论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代以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为对立面进行论战的并不只是《中国青年》。本论文要论及的郭沫若也属于同样情况。郭沫若的论战对象不是“醒狮派”,而是属于“国家主义”系列的“孤军派”。

如前所述,《中国青年》与“醒狮派”的论战始于1924年11月,而郭沫若与“孤军派”的论战则始于一年之后的1925年10月。论战的大致内容详见附表。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是在与“孤军派”的论争当中提出来的。经过这次论争,郭沫若来到了“革命圣地”广东。

如果我们以192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孤军派”为标准,对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广东之行及参加北伐的思想背景等一系列行动作一衡量的话,一定能够有所发现。

进入1980年代,中国也出现了若干篇论述处于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的文章^②。问题在于,这些论文把郭沫若与“孤军派”的联系完全割舍掉,似乎郭

^① 以往有关192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义”“醒狮派”问题的研究成果有荫山雅博的《关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家主义派及中国青年党的动向》(《学习院史学》第13号,1977年1月),江崎隆哉的《关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家主义派——以1925年—1927年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19号,1986年12月)等。从江崎的论文中我了解到很多情况。

^② 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郭沫若的资料我参阅了以下论文:刘思久《郭沫若“五卅”运动前后的政治观——读〈盲肠炎〉札记》,《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郭沫若研究专刊》第2辑,1980年;陈福康《郭沫若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前;卜庆华《“飞向自由的王国”——试论郭沫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增刊;乐齐《“把头埋到水平线下”——一九二四年宜兴之行在郭沫若思想转变中的地位》,《郭沫若研究论集·第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孙党伯《思想转换的途中》,《郭沫若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龚济民、方仁念《登上“宝筏”前后》,《郭沫若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沫若与“孤军派”的关系一开始就是水火不相容的。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一书中写道：“在实质上‘孤军派’的人实比‘醒狮派’的人高明得多。”^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说明了什么？此外，易君左在回忆录《曾琦与左舜生》^②一文当中称“孤军派”“居于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对上述1920年代中国“国家主义”系列的“孤军派”，可以说以往没有对其进行过认真的回顾，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探讨这一问题的缘由之一。

本文试图以1920年代中国国家主义“孤军派”与郭沫若的关系、郭沫若与“孤军派”的论战为坐标，对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论的背景、郭沫若的广东之行、郭沫若参加北伐的意义进行探讨^③。

一、郭沫若与“孤军派”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1922年——小谷注）。那时商务编译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来的‘孤军派’，集合起来要出一种政治性的刊物。主脑是陈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学。”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在论战开始之前与“孤军派”有很亲近的关系。郭沫若的论战对象不是“醒狮派”，而是“孤军派”，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作为郭沫若论战对象的“孤军派”是1922年9月15日创刊的《孤军》杂志以及依附于其后身杂志《独立青年》的人们。《孤军》创刊时的成员有陈慎侯、何公敢、林灵光、周昌寿、郑心南等人，之后作为同人加入的有周佛海、资耀华、郭心崧等。在人员构成上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他们均为旅日留学生，且很多人属于留学生团体丙辰学社的成员；其次，周佛海等“孤军派”的“第二代”人多为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河上肇的门生。顺便提一下，郭心崧、周佛海1922年毕业，资耀华1923年毕业，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就读于京都

① 本文中《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篇》的译文皆依据平凡社东洋文库所收小野忍、丸山升译的《郭沫若自传》。

② 易君左：《曾琦与左舜生》，载朱传誉主编《曾琦传记资料·一》，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③ 我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及其它——创造社向左转的先声》（伊藤虎丸、横山伊势雄编《中国文学论》，汲古书院，1987年）一文中简单地涉及过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和与“孤军派”的关系。

帝国大学。

丙辰学社也就是后来的中华学艺社,于1916年12月3日在东京成立。发起人有陈启修、王兆荣等48名旅日留学生。据《外事警察报》第25期有关“中华学艺社”^①的记载,周昌寿在丙辰学社中的社员编号为第5号,郑心南为第35号,林灵光为第36号,他们均为丙辰学社的发起人。陈慎侯为第174号,何公敢为第128号。

郭沫若与“孤军派”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其留日并加入丙辰学社之时。1918年在九州福岡的箱崎海岸,郭沫若与因参加反对日中军事协定运动而被迫回国的张资平偶然相遇,他们一边在海边漫步,一边就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进行了交谈。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郭沫若当时很自然地 toward 张资平问起机关刊物《学艺》的事,郭沫若问道:“丙辰学社出的《学艺》杂志名誉还好吗?”郭沫若在此只字未提他本人与《学艺》的关系。实际上,与“孤军派”的关系同他加入丙辰学社有关,但这些诸如郭沫若与丙辰学社的关系等在《创造十年》中也均未提到。

关于郭沫若加入丙辰学社的原委,我们可以从郭沫若1921年1月27日致张资平的书简(《学艺》第2卷第10期,1921年4月1日)中有所了解。据前面提及的《外事警察报》“中华学艺社”一栏的记载,张资平在丙辰学社中的社员编号是第118号,1917年5月已经加入丙辰学社^②。张资平此时曾劝说郭沫若加入丙辰学社,上述书简是郭沫若对此事的回答。从书简中得知,郭沫若此前曾两次被人劝说加入丙辰学社。第一次是丙辰学社成立时的1916年,受到朋友吴永权、陈启修的劝说;第二次受到四川成都高等学堂时的同学、后来成为“醒狮派”主将的曾琦的劝说。据郭沫若说,对这两次劝说的拒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加入丙辰学社仅仅是由于写好某篇文章,并将在《学艺》上刊登,因而出现了加入学社的想法。信中还提到,出于上述想法,在受到第二次劝说时,连稿纸都领了。

郭沫若所提到的“某篇文章”是指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埋没的庞贝城的命运与焚书坑儒之事相交错的《我国思想史上的澎湃城》一文。郭沫若在信中一边向张资平介绍自己的构思,一边恳请张资平再宽限几天。

① “中华学艺社”:见《外事警察报》第25号。同时这里还可看到以下附注:“本文是3月15日中华学艺社发表的该社情况之译文。”

② 《丙辰学社职员录》,《学艺》第2号,1917年5月。

从这里我们并不是感觉不到在创造社马上就要成立时郭沫若内心的一些顾虑,总之,从郭沫若一方来说,没有拒绝对方的充分的理由,这也是事实。之后的事情完全按照郭沫若在信中对张资平所说的那样进行。日后,郭沫若在《学艺》第2卷第1期(见前)发表了诗剧《湘累》,在第3卷第1期(1921年5月30日)发表了约好的论文《我国思想史上的澎湃城》(未完),1921年4月前后加入丙辰学社,社员编号为第249号。

郭沫若与《孤军》主编陈慎侯结识也是缘于郭沫若加入丙辰学社一事。1921年4月1日,郭沫若因泰东图书局(后成为《创造》季刊的发行社)改组一事与成仿吾一道回国,来到泰东图书局。郭沫若与陈慎侯相识是在那不久之后的5月。郭沫若从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陈慎侯那里听到他在《学艺》上发表的《湘累》等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从此开始了两人的交往^①。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一书中写道:“我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郭沫若接近“孤军派”也是因陈慎侯的原因。据同为“孤军派”成员的郑贞文(心南)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一文中得知,陈慎侯名承泽,1885年生,福建人,清代举人,曾赴日留学,学习法政、哲理等,之后参加辛亥革命。历任福建省都督府政务院参事兼秘书长,国会议员。以福建省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活动,活动结束后辞职。从1909年开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法政经济部的编辑工作。陈慎侯对中国文字学有很大兴趣,曾在《学艺》上发表《字义研究法》《词性概论》等论文。编写了《国文法草创》一书,以“整理国故、宣传文化为己任”,力图改变中国“政治的弱体、社会的堕落”。

陈慎侯的身体似乎欠佳。他与郭沫若的往来也因陈慎侯去北京治病、郭沫若为继续完成学业于1921年9月再度赴日而暂时中断。两人恢复往来是1922年7月的事。当时郭沫若为了编辑《创造》季刊的第1卷第2期而回到上海,郭沫若称当时到陈慎侯那里“过从几度,受教良多”^②。

这些事情大概都是因有上述背景才发生的。不久,因杂志发行的问题他们委托郭沫若帮他们向泰东图书局介绍。关于此事,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这样写道:“他们的杂志本可以在商务出版,因为不便说话,便托我介

① 郭沫若:《月光·附记》,《学艺》第4卷第4期,1922年10月1日。

② 同上。

绍由泰东刊行,因此我也被视为了准同人之例。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也列过几次席。”

郭沫若此后一直被他们视为“准同人”。

1922年9月15日,《孤军》杂志由泰东图书局创刊,但陈慎侯却在创刊前的8月8日因丹毒不幸逝世。

陈慎侯逝世后,《学艺》杂志出版了追悼陈慎侯之死的“追悼专号”。刊登了陈慎侯死亡的消息、陈慎侯的绝笔《孤军宣言》、《孤军》杂志的广告、追悼陈慎侯的文章等。收到的追悼文章有两篇,一篇是林志钦《听见陈慎侯死去的感想》,另一篇是写有“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的郭沫若的剧作《月光》。

郭沫若在《月光》中把杂志《孤军》改为《孤灯》,把陈慎侯改为在黑夜中为寻找一线光明与同志一起孤军奋战的“博士”。“博士”在自己主办的杂志《孤灯》创刊之前病倒,从窗户射进来的月光使他想起了母亲的爱抚,他吟诵着小时候妈妈教给他的诗《春江花月夜》,他仿佛看到了故乡的大海和召唤自己的母亲,在幻觉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郭沫若在此倾注的感情从以下“附记”中可以一目了然。郭沫若这样写道:“正自私心庆幸之余,不忆月之四日突闻先生抱病。冗事纠缠,尚未趋唁,月之八日,而先生竟已遄归道山。嗟乎,撼其有极耶!昔者 Goethe 临终,呼曰:‘Mehr Licht! Mehr Licht!’ Carlyle 犹赞之为‘圣者之死’。闻先生属纆时,则对月而高近吟,想佛氏所谓‘大往生’者,当亦不过如是而已也。”

陈慎侯去世后,《孤军》杂志由何公敢、林灵光等人接手。何公敢是福建闽侯人,1887年生,名松龄,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同陈慎侯一样,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再度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专攻经济学。回国后进商务印书馆。陈慎侯去世后,成为《孤军》实际上的主编^①。

林灵光与何公敢一样为福建人,名骥,字质夫。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林学专业,是《孤军》派的理论家^②。后面我们要提到的郭沫若与“孤军派”的论战中,“孤军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他。

遗憾的是,《孤军》杂志第1卷在日本不能看到,据前面提到的《学艺》第

^① 参见郭沫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附白》(《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注释中“何公敢”之条目。

^②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